

工 高 經 濟 史 料 叢 刊

第 三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北京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4年4月 第一版 · 198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7.1¹/₄, 字数, 191000

印数, 1~4500册 定价, 0.85元

统一书号, 11224·133

编辑者：寿充一 徐绪堃

张帆 于渝生

-
- 1 严仁赓 回忆陶孟和先生
7 沈性元 敦厚·正直·勤奋
——我所知道的陶孟和先生
13 千家驹 陶孟和与社会调查所
19 王子建 陶孟和怎样主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28 郑友揆 高尚的品德 开阔的胸襟
——忆陶孟和先生的业绩
34 杨西孟 追求真理 不断前进
42 吴 铎 春风化雨十一年
许 杰 陈翰笙
52 李文治 韩德章 关于陶孟和先生
彭泽益 汪敬虞
-

·人 物 志·

- 59 李国伟 69 叶揆初 76 王志莘
80 关伟林 83 丁堂贵 87 孙瑞璜
92 吴百亨
-

·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

- 97 刘念智 峰回路转万象新
102 汤蒂因 曲曲折折 走向光明
113 杨少振 三十二年来的经历
-

· 海外华裔工商业者 ·

- 129 李文杰 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海外关系
143 支懋彤 华昌与大陆
——天津早期的国际贸易商户
-

· 工商经营管理经验 ·

- 153 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州市委员会 刘国钧经营大成纺织
常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染公司的经验
163 竺培农 竺培元 竺培德 竺梅先与民丰、华丰造纸
厂
179 周 浚 上海金星金笔厂简史
192 林炳炜 钟牌414毛巾是怎样成为名牌的?
-

- 196 张公权 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分析(续二)
-

- 211 黄曦龄 解放初长沙工商界华北、东北参观记
220 卢广绵 访问瑞典英国合作社观感

回忆陶孟和先生

严 仁 赓

一

陶孟和原名履恭，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89年。

陶孟和的父亲陶仲明是一位饱学之士，曾受聘于天津教育家严修（范孙），课其子侄和亲友子弟。陶仲明患有严重肺疾，病逝时陶孟和尚未成年。

严修是清朝的翰林，曾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授贵州学政，远道去黔考察教育，开办新学。甲午战败（1895）后，他深感挽救危亡，非自改革教育制度入手不可。曾谓：“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①又说：“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存，非讲学不能育才，非合众不能砺学，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②可见，他是一位典型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前夕的1897年，他奏请清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指讲授现代科技各学科的新式学校），从而不能见容于顽固派，罢官回籍，专心兴办新式学校。

1892年，严修聘陶仲明在严氏义塾课其子侄，陶孟和同受业于其父。仲明先生学识渊博思想开明，严修对他十分敬重。曾云：“吾乡通敏适时之俊，予所最心折者，陈奉周、陶仲明、并王寅皆而三”。③陶病逝后，严修撰挽联有云：

经籍史乘、金石文字、训诂辞章、医方算数、列朝掌故，旁
遶海外图书，学胡博哉！吾尤服君，居心诚恳，虑事周详，立

① 《南开校友通讯》，复刊第一期，1981年10月。

② 《使黔日记》，1896年。

③ 陈中岳：《蟾香馆别记》。

志坚定。

劝谕讽诫、挟持调护、讨论辩驳，讲贯切磋，处世箴言，兼及家庭琐事，教多术矣！君之于我，忘形宾主，异姓兄弟，急难友生。①

1901年，严修改定先人所设严氏义塾的课程，并借陶仲明家设学一处。这一年，陶仲明病逝，严修与林墨青集张馆（张伯苓）、陈馆（陈哲甫）、赵馆（赵幼梅）学生十一人，计严智崇、严智怡、严智惺、王宝璐、韩振华（诵裳）、林澍、严智勇、林涵、陶履恭（孟和）严智锺、张彭春于私宅北书房而誓之。严修作誓词曰：“尔十一人者，或为累世之交，或为婚姻之谊，辈行不必齐，而年齿则相若。尔父若兄，道义相删，肝胆相许，志同道合，而患难相扶持，尔诸生所亲见也。尔十一人者，自今日始，相待如一家，善相劝，过相规，毋戏谑，毋诟争，毋相誉笑，毋背毁，毋面谩，同心壹力，从事于学问。以绳检相励，远非僻之友，警浮伪之行。毋作无益害有益，毋偷惰，毋轻躁。兄弟婚姻，互为师友；敦品修业，以储大用。是余等所厚望也。陶履恭，孤儿也，当厚自策励，以去其童心。尔十人之待履恭也，悯之、爱之、砥砺之，使无坠其家学，是则今日此举为不虚矣”。誓既毕，十一人环相向，一跪三叩。礼成，退。②

1903年，严修改良家塾，为子侄及亲友子弟设严氏家塾，聘张伯苓等为教师。次年，改家塾英文馆为敬业中学堂，陶履恭、韩振华、张彭春、梅贻琦等人均成为敬业中学堂师范班学生。1906年，敬业中学堂建新校于南开，改称南开学校。陶履恭等为南开学校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

陈宝泉（筱庄）在《严先生事略》中曾谈到以上过程：

“先生本多佳子弟，复聘陶仲明、张伯苓名宿为之师。

陶君早卒，张君系具有教育毅力者，首建议自家塾扩充为敬业中学，招生百余人。后以传学者众，移其校于南开，即今

① 陈中岳：《舞香馆别记》。

② 同上。

日之南开学校也。至当日在家塾读书者，虽人数无多，而成就甚伟。除公之诸公子昭昭在人耳目外，如韩诵裳、陶孟和、武向泉诸君，均为一时特出之秀云”。①

在陶孟和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对他在思想上、治学上和作风上影响较大者有三人：一是他父亲陶仲明，二是严修，三是张伯苓。由于他幼年失怙，在严修亲自抚育提携下长大成人，因而严修的思想 and 作风，对陶孟和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留学英国的几年，陶孟和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此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段时期，又受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的熏陶。这样，陶孟和便成为一位反对守旧、提倡革新、有开明的资产阶级学者风度的著名社会学家，具有耿直、敦厚、谦逊、诚朴、清廉、不尚虚夸、不徇私情、摒除门户之见等优良品质。

二

1929年陶孟和受中美庚款基金董事会之托，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4年7月，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于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陶孟和主持这两个所的工作，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

二十几年，他以著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一贯强调对中国社会进行亲临其境的调查的重要性，以便从调查的实际资料中找出切中时弊的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他能以身作则，曾亲自作实地调查，例如对北平市近郊工人生活的调查，便是一例。

强调实地社会调查，从中梳理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孟和先生主持社会调查所工作时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优点。这一特点，曾长期成为社会调查所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改称经济研究所）的一贯传统，我对此体会颇深，不妨以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为例：

① 1929年春在南开学校追悼严修大会上的悼词，见《严范孙先生手劄》一书附录。

从1934年初成立财政组并商定以当时还是中国财政这门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点的县地方财政作为此后一定时期主攻方向之时起，直到1941年下半年为止，这段将近八年的时期里，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进行较为广泛的或是属于专题性质的调查，取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资料的分析、研究，先后完成专著、调查报告、论文等约二十项。并且，在此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为进一步着手《中国之县地方财政》一书的编著，提供必备条件。

除财政组外，其余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史、劳工、人口、行政等组的研究工作，也同样体现了这一重视实地调查的突出特点，都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编纂出许多专著、报告、文章。

陶孟和先后主持两所工作值得一提的另外一点则是：在确定主攻方向之后，能够放手让从事研究的人员按照计划去工作，很少横加干涉，也不中途打乱，以保持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又是他主持研究工作的另一个长处。但是，不横加干涉，并不等于不予过问或不予协助。所以，当调查或研究工作需要他出面时，他总是竭力提供外部条件以及必需的内部条件（例如经费开支等物质保证）。

由于重视实际调查，又能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还能为研究工作提供必需的甚至是充实的物质保证，因而，社会调查所以及其后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和所刊《社会科学》杂志登载的专文，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有较为充实的现实资料；不仅在国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同时在国际学术界也产生影响。所有这一切，同孟和先生的办所方针和他的领导作风，是分不开的。

三

二十几年，陶孟和提拔后进不遗余力，培养了一批直至今日

在我国经济学界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他网罗的研究人员中，一小部分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有成就的学者，但是，大部分仍然是他商请国内著名大学经济系和社会系给他推荐的优秀毕业生。在选拔、培养、使用新生力量时，孟和先生不存任何门户之见。不论来自清华、北大、燕京、南开、武汉、中大或其他大学，均不分畛域，一视同仁。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招聘人员到所后，每人除通过调查研究中的实际锻炼得以提高业务水平之外，又都给以其他的进修和提高的机会和时间。例如，通过他们的公私关系，几乎每年都要派送青年研究人员出国进修。这对于不断加强研究人员的理论基础、提高专业水平和开扩他们的眼界，都起了重要作用，是一种具有远见的基本建设性质的培养计划。

另外，我还记得，从“调查所”时期开始，作为一种固定制度，每周定期开一次“读书会”。事先，商请一人就自己当时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研究成果，或是外出调查的经历，或是读书的心得，在会上作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孟和先生积极参加这种活动，有时还亲自作报告。这一活动，也同样是为研究人员提供的扩大知识领域、提高业务水平、交流学术成就的途径之一。

前面提到，孟和先生十分重视实际调查。但并不是说他就轻视理论研究了。从国外归来的几位学者都是理论基础广博、专业知识雄厚的经济学家。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另外，在研究人员中，也有少数人专门从事理论性的探讨。

孟和先生平等待人，扫除等级观念。审阅修改青年人的研究成果时，从来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也从来不惊人之美，在经过他审阅修改后的文章上并不加署自己的名字，这也表现了他的高尚品德和民主作风。

四

孟和先生在政治立场上是明朗的。他倾向进步，憎恶国民党

的腐化反动。在主持社会调查所时期，曾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利害，为慕名而不止一次延聘冀朝鼎同志来所工作，但都遭到当时反动的华北军政当局的批驳。此后，始终保持他那开明的、进步的政治立场，提倡改革，反对倒退，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绝不介入当时的黑暗政治，保持一己的超然地位。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对洋人绝不卑躬屈膝。这一态度，同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某些研究集团之各立门户、排斥异己、互相标榜、互相攻讦、吹拍钻营、身兼学阀政客两任、唯洋人马首是瞻的恶劣作风截然不同，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孟和先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只曾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他以南开校友关系和在“参政会”上的工作关系，同周恩来同志相熟谙。1940年，研究人员梁方仲有兴趣研究解放区的土地制度。孟和先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梁的希望，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助和支持，使梁方仲得以顺利抵达延安，从事调查。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一再强迫经济研究所随前中央研究院一些别的研究所一同搬迁台湾，孟和先生始终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解放，把大量的珍贵图书、资料、文献、设备保存了下来，为人民立了功，表现了一个爱国的、倾向于进步的学者的骨气，受到人们的崇敬。

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孟和先生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领导全院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工作。他虽健康日益恶化，但仍积极工作。1960年他力疾去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会议，因操劳过度，不幸逝世，终年71岁。

（1982年仲夏，于北京大学）

敦厚·正直·勤奋

——我所知道的陶孟和先生

沈 性 元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二姐夫。我自幼因父母去世早，长期寄居在大姐夫黄郭家，寒暑假期间或大姐夫和大姐出国期间，则常住到二姐家。我结婚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同他们不在一个地方，但几十年中来往是比较多的，对二姐夫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现将我的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陶孟和先生（原名陶履恭，祖籍浙江绍兴县），天津人，生于1889年，死于1960年，终年71岁。

陶父仲明先生曾在天津严范孙先生创办的严氏家塾任教多年，为人好学，家中藏书甚多。仲明先生思想较新，家中曾保存着他写的一篇反对女子缠足的文章。陶先生童年时期在父亲的教育下，受到一定影响。仲明先生病逝时，陶先生仅十五岁。

陶先生自幼在严氏家塾就读。1904年家塾改为敬业中学堂，1906年以后，学堂迁至南开改称南开学校。陶先生为南开学校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后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一度任教务长。1929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成立后任所长。1934年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仍任所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国有名的学者、社会学家。

陶先生好学，我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在他家经常

看到他手不释卷。他对一般的喜庆应酬有反感，认为无聊可厌。记得有一次我的舅舅葛敬中先生过生日，作为小辈照例应去舅舅家拜寿。（地点在西直门，当时的农业大学，舅舅在那里执教）。但他说要赶写一篇文章，坚决不去，结果二姐带我换乘二次黄包车去了，路相当远，冻麻了手脚。第二天二姐看见二姐夫书桌上铺着的稿纸还是照旧的二行，一字未增，很生气。原来他是躲在家里守着火炉看书，并未动笔，他怕应酬，借口说要赶写文章。他一生，看书是最大的爱好，书籍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宝”。陶先生的一些熟朋友曾经这样形容过：“孟和有‘三宝’，书、烟斗、太太”。

二

陶先生为人敦厚、正直、清高，不愿做官，是位洁身自好的学者。他父亲与徐世昌是世交，民国初年陶先生从英国留学回来，徐拉他，他坚决不从。后来我的大姐夫也怂恿过，想借重他，他也不肯迁就。这是他的原则，任何官场私情，他一概拒绝。

陶先生不阿谀逢迎，不敷衍权贵，曾自认为“六亲不认”。我的大姐夫黄郛先生与他虽是连襟，但他在政治上也决不迁就敷衍。那时北大的一班学者、教授，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攻击大姐夫。大姐曾对二姐说：“孟和为什么不能给缓冲一下呢？”二姐对大姐的这种指责，也不能接受，认为政见不同，是不可勉强的。

1934年前后，二姐夫在北京工作期间，过从较多的是李四光、唐钺、钱端升、金岳霖、颜任光、丁西林、张奚若、梁思成、张慰慈、陈西滢、凌叔华、林徽音……等，当然还有五四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也常有往来。在周末，一些朋友常在东城的饭馆里聚餐，他们对当局不满，议论颇多，发泄着忧国的情绪，也常常说些俏皮话，成为当时书生们的风尚。陶先生给人一种印象：他似乎喜欢引些别人的“闲话”，而并不

固执己见似的。当时的学者名流，是有正义感的，他们写文章，或是用幽默的语言来指责、批评当权者的误国误民。记得李四光先生在这些入当中，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位，脸上常常带着笑咪咪的神情，这印象也是给人较深的。陶先生和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互相尊重、关心。陶先生在晚年更感到李先生在新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远远超过旧时代，所以对李先生的健康、休息，十分关切。有几次我们一同往访，他总想着李先生的时间可贵，不愿久坐，而李夫人——许淑彬则喜欢留客人多聊聊天。

二姐夫希望国家好起来的心情殷切，对工作负责，用人不分亲疏，只看能力。缺点是看问题容易受别人影响，有时无定见，易冲动，对人有偏见，但没有私心。如他对郭老有自己的看法，也许就是偏见，为此事曾受到周总理的劝告、批评，说他不该只看郭老的缺点。在旧社会他看不起何廉，认为何喜欢把他人成果据为己有。他有句口头语，对嫌恶的人或事常要骂一声“狗食”。对他所钦佩、有才学的后辈，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用人唯贤，这也是陶先生突出的品德。他有一个很赏识的学生——汪敬熙，言谈中常提到这位得意门生。对方显廷也很看重。

三

陶先生自幼家庭比较清寒，养成了生活朴素的习惯。记得我到他家过寒假的第一个冬天，曾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的书房里生着火炉，常见他拿起捅炉子的钩子，捅一下火，出些炉灰，炉灰里有煤渣，那怕是栗子大小的或更小的一粒煤屑，他也要用铁钩钩出来，放进煤斗里，或是打开炉门，送入火炉。我好奇地看着二姐夫的这个举动，无形中影响了我，使我也养成节约的习惯。这位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穿着长袍，俯着身子，为了不舍弃一小块煤屑而埋头挑拣的景象，是深刻动人的。事实上他那时的生活开支，确实很紧。北洋政府时代，政局动荡不定，大学教授的工资七折八扣，他负担全家老小的生活，除教书外，要写

文章，借稿费作补贴。我二姐也搞英文翻译，她译的长篇科学读物，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过，为读者所欢迎。此外，二姐也翻译些西洋短篇、中篇小说，所得稿费，用以弥补家用。他们买了北新桥小三条15号的一所大院子，是向天津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借的钱。勤俭持家的二姐，好不容易还清了债务。在开国初期，陶家的藏书数百册，其中有明版的珍籍，全部赠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二姐夫对身外之物看得很轻，包括他父亲的收藏，认为古书虽珍贵，但应该送与大学图书馆，才最有意义。解放后，二姐夫决定把住房交给科学院，作为公用，他自己则住在科学院宿舍，仍然过着一般学者所习惯的生活，除了看书，空闲时找人谈天或到公园走走。

抗战时期，他们住在重庆李庄，生活十分艰苦。二姐因肺弱缺乏营养，体力更差了，我哥哥接她到兰州去住，那里有牛奶可买，能够补充些营养。但不幸她有一次感冒，转为肺炎，兰州缺少好医生，竟在那里病逝了。灵柩托人启运之前，因路远不便，在当地土法火葬。骨灰运回北京，二姐夫带着儿子亲自安葬在万安公墓，碑文是请好友韩诵裳先生书写的。墓前围种一圈小松树。“沈性仁女士之墓”旁边留有二姐夫自己的墓穴，一切从简。他处理这件事没有惊动任何亲友。后来，张奚若先生和他夫人都有点怪二姐夫，为什么不让朋友参加二姐的葬礼。二姐夫一向不喜欢为个人私事惊动别人，这也是他的性格。新中国成立后，他心情更为开朗，但是他的心脏病有时复发，就住进医院疗养。他一进医院，就让人代打电话告诉我们，叫我们放心，不要去看他，他喜欢静养，静养不见客，恢复得快。还补上一句：水果香蕉之类齐全，关照我们不要给他送。二姐夫看起来处事粗枝大叶，实际他是很体贴人、关心人的。二姐去世后，他一直没有再结婚。

解放后，他收入较丰，除了补助他的姐妹生活外，钱还花不完。一向不注意穿着的二姐夫，居然常到王府井的高级服装店添置新装。当他穿了满意的中山服或大衣时，总要在我们面前夸赞

一番裁缝的手艺高明，显出老人“孩子气”的神情。我们往往暗笑他老来这样“爱打扮”，但也理解这生活中的小变化，这反映出老人的“自得其乐”，我们为他高兴。再有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情，二姐夫自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症以后，对于饮食非常注意，请人吃饭，他欣赏别人的胃口好，而自己不动筷子。在假期中我儿子成为二姨夫的座上客时，他老人家似乎特别开心地欣赏、赞许年轻人的好胃口。

四

陶先生为人正派，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抗战胜利后，他看到蒋政权的倒行逆施，腐朽无能，毅然接受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到共产党深得人心，必能取得最后胜利。在解放前夕，他决心不离开上海，以待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二姐夫那时内心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我一直到后来才理解到。

新中国成立前，我由台湾到香港，他曾来信叫我设法找到王文伯、梅贻琦、李书华三位，要他们千万不要出国，应该回到大陆。我当时住在九龙，把他这番话告诉孙越崎先生，孙不认识王、梅、李三位，转请翁文灏先生代达此意。可惜时间不巧，这三位先生已经先后离港出国了。后来得知这件事是周总理示意陶先生写信劝告这三位学者的。

解放后，二姐夫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虽然对于分管图书馆工作感到很清闲，不甚满意，但仍积极负责。1957年整风反右前夕，他被约参加在《大公报》馆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会上发表意见，话说得很直爽，后来在科学院挨了批评。他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对我说：“三妹，我不干了！”当时乙黎（钱昌照）适不在家，我也直率地说：“怎么叫不干了，党叫你干，你就该干。”原来他认为政府对旧人员的工作安排，有的太保守，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在那次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1960年人大、政协两个大会刚开完，科学院接着在上海召开

会议，陶先生和李仲揆先生相约都不参加。李因连着开会过累，接受了二姐夫的劝告，这次不去。起初，二姐夫也接受李先生的情意，说这次会议重点在自然科学方面，他还是多休息一下好，因而答应李和我们的相劝，决定不去上海。一天下午，我刚从民族文化宫会毕到家（乙黎因参加民革大会，起草一个文件，留在那里未返），忽然接到二姐夫的电话说：“三妹，明天我到上海去开会，南方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办。”我很惊讶地回答：“姐夫，你不是说好，跟仲揆先生相约，二人都不参加这次会么？乙黎和我都认为两个大会之后，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虽然最近你身体不错，但南方暮春时节气候常有变化，还是不去的好！”他回答说：“票子已经买好，身体也没问题。”时已傍晚，我因开会有点累，就只得说：不去看你了，南方无事可托。只是请多带些衣服，以防早晚春寒需要。

孰知他到上海不久，在去参观工人新住宅区的路上，就因心肌梗塞症复发，进了医院。我收到他病危的电报后，赶赴小三条二姐夫的六妹陶履莘住处，和她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奔赴上海，一到上海，方知就在我们动身的当天午刻，他竟离开人世了。我们把这不幸的噩耗，立即电告他的长女知悉。她从旧金山拍来哀痛的唁电，但无法奔丧。二姐夫的儿子愉生则由大连乘飞机奔沪，在北京碰上乙黎同行。上海的亲友、科学院、所方的同事都来吊唁，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灵前追悼仪式，火葬完毕，由愉生护送骨灰回北京，在北京中山堂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会。仲揆先生诸位为陶先生的突然不幸病逝，尤为悼伤。我们陪愉生去看了陶先生的生前好友李仲揆先生，愉生从衣袋中取出一串钥匙，上面有把小刀是他父亲的遗物，送给李伯伯作为纪念。李先生默默地收了下來。